

# 论不确定时代道德教育的双向境遇及其应对

章乐

**【摘要】**当前正处于不确定时代，个体生存的不确定性、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特征。在不确定时代，虽然道德教育要面对人际信任丧失与道德冷漠，传统科技伦理出现真空，以及民族和国家等群体性自私的危机，但是也迎来了直面道德选择并承担道德责任，从近距离伦理转向远距离伦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机。为了化解不确定时代的危机并利用其契机，道德教育应该重视法治观念和他者责任意识的培育，风险意识和远距离伦理观的培育，以及类本性的激发和关系思维的培育。

**【关键词】** 不确定； 不确定时代； 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章乐，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 210097）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不确定时代。不少人都谈及了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比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流动的现代性”和罗伯特·麦克唐纳(Robert McDonald)的“乌卡时代”等。当然，不确定并不等于消极，它既意味着危机也意味着契机，对于道德教育同样如此。在不确定时代中，道德教育应该如何积极回应？

## 一、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性

如果将不确定性视为对当代某个特征的整体性描述，那么具体来说，不确定性又涵盖了哪些维度？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指出在确定性的时代终结之后，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寻求答案。<sup>[1] 21</sup> 罗朗·柯恩-达努奇(Laurent Cohen — Tanugi)则从政治的视角强调，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被全球一体化和地方分裂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所塑造的、既充满战争风险又孕育和平希望的二元世界。<sup>[2]</sup> 中文版前言1 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从经济学的视角指出，由于资本市场的波动性以及人类本能地寻求安全避风港的倾向，那些难以预测和防范的经济动荡成为一种必然现象。<sup>[3] 33</sup>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贝克、鲍曼以及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学者则从多个角度对不确定性进行了剖析。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极权的扩张、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恶化、核冲突以及大规模的战争都是构成当前时代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sup>[4] 150</sup> 贝克则通

过三个核心命题来探讨此问题：第一是“风险社会”的概念，其中风险的逻辑超越了财富的逻辑，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第二是“个体化”的强制趋势，即个体逐渐脱离传统关系网，需独自应对各种生存挑战；第三是“多维普世化”，在科学根基受到质疑的背景下，其确定性也随之消解。<sup>[5]</sup><sup>5</sup> 鲍曼则从四个方面来描述：一是传统国家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从政治上无法控制的全球空间。二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纽带丧失。三是长期性的思考、计划及行动日渐崩溃，造成生活的碎片化。四是环境变化多端，但解决困境之责却落到了个体头上。<sup>[6]</sup><sup>1-4</sup> 加尔布雷思从三个方面来描述：货币带来的不确定性，军备竞赛引起的不稳定以及贫困问题解决的不确定性。<sup>[7]</sup><sup>127·180·226</sup> 虽然学者们对不确定的维度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以下三个维度需要重点关注。

### （一）个体生存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时代的第一个维度是个体生存的不确定性。其一，陌生人的交往成为主导。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交通工具飞速发展，个体活动范围和流动性日益增强。原来个体一生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某个地方度过，但是，现在不同了，个体一生往往需要生活在更多的地方，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交往。比如，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每天需要与很多人交往，但大部分的交往对象都是陌生人。可以说，人们的生活已经，或者说早已，走出了传统的熟人小圈子，投入了陌生人的社会。<sup>[8]</sup> 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指出，陌生人“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人，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陌生人的到来与停留意味着将一种新的、异质的因素导入了熟人共同体，使之面临着一种新的“正面的关系”<sup>[9]</sup><sup>341-342</sup>。这种关系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它不是单纯的远，也不是单纯的近。这种奇怪的关系恰恰意味着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当下正处于由熟人交往转向陌生人交往的过渡时期，两种秩序的并存与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

其二，谋生的不确定性增加。在今天，职业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之前热门的职业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急剧萎缩，甚至消失。当然，一些新兴的职业也随之诞生，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比如，外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带货人等。传统职业萎缩和新型职业诞生的速度增快，让人们在谋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感。这也是当下很多人热衷于“考公”“考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职业至少给人一种相对的确 定感。不仅如此，伴随着“个体化”进程，这种不确定感进一步加强。“个体化”进程是指个体从传统的可以依靠的关系和群体中“脱域”出来，逐步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支持，需要依靠个体独自去面对各种挑战。比如，在上个世纪末之前，作为“单位人”的个体还可以依靠单位应对种种不确定。然而，现在的单位早已失去了曾经的功能。

其三,家庭的稳定性减弱。曾经家庭是人们生活的港湾,当人们在外遭遇了各种压力、不幸等,还可以回到家中抚慰和疗伤。家庭给人以安全感,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世界的种种风险。然而,在不确定时代中,家庭的传统功能逐渐丧失。一方面,家庭变得不再稳固,离婚变得越来越常见。即使没有离婚,但因日益增加的离婚率也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消极影响,使其难以将家庭再视为生活的安全港湾。另一方面,随着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个体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组建家庭的意愿日益降低,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传统功能。

## (二) 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科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深化,以及科技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加剧,科学认知能力的局限性逐渐凸显。这种局限性在知识的创造、运用及基于知识做出决策的过程中表现为各种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这即是科学技术领域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特征。<sup>[10]</sup>

其一,科学的不确定性。历史地看,科学的结论和理论并非一成不变,在未来常常要修正,甚至否定,这表明特定时期的科学结论和理论并非最终真理。不仅如此,近现代以来的科学研究依赖于科学实验,但是科学实验与真正现实有所不同,前者是将现实中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排除在外,以便在理想,甚至孤立的条件下进行。当科学研究的结论被应用于现实时,被实验所排除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又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因而带来了与理想化的结论有所不同的不确定性。即使在理想化的实验中,由于受到经济条件、考核压力等多种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验观察者并不能够保证其观察结果的绝对中性,进而带来研究结果的某些不确定性。科学的应用也存在不确定性,因现实中应用者的经济利益和价值取向等不同,会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应用后果。<sup>[11]</sup>说到底,科学的不确定性是源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之理性的有限性。王建华指出,科学作为一种基于理性的认知活动,其不确定性本质上源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只要世界充满复杂性,同时人性和理性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科学认知过程就必然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难以完全控制的特点。<sup>[12]</sup>

其二,技术的不确定性。前几次的技术革命,使人们看到了技术的巨大威力。但是环境污染等事件的发生也揭示了技术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应用阶段,技术的负面效应可能都无法被完全预见和理解,这种未知性体现了技术功能的不确定性。<sup>[13]</sup>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借助复杂性理论的视角,揭示了技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特性——自相似的“递归性”。他提出,技术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不同层级、相互交织的技术元素共同构建而成的。这种递归性的结构意味着,技术

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自我参照和迭代,从而在不同规模和层次上呈现出相似的模式。<sup>[14]</sup>  
37 然而,由于“初始条件敏感性”的影响,即使是微小的初始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进而给未来的技术预测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鲍曼进一步明确了技术的不确定性,他指出,技术的变化扩大了人们行动的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待解决问题并未呈现减少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sup>[15]</sup> 142-143 对于技术的负面影响,有人将其归之于使用的不合理。但是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看,技术的负面效应并非不合理的使用。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曾指出,“并非只有当技术恶意地滥用,即滥用于恶的意图时,即便当它被善意地用到它本来的和最合法的目的时,技术仍有其危险的、能够长期起决定作用的一面”。<sup>[16]</sup> 昆也指出,“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并列”。<sup>[17]</sup> 16 这表明技术存在内在的风险。

其三,现代科技加速发展引发了不确定性加剧。现代科技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或创造性活动,而创新或创造本身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平衡,寻求新的平衡。<sup>[18]</sup>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诸多积极意义。比如,现代交通工具让人的出行变得快捷方便;互联网技术让人的沟通变得日益便捷;机械化,尤其是人工智能让人逐步从机械、重复性的劳动中脱离出来,可以专门从事创造性的劳动;现代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让人的寿命大大延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是否会对人类构成威胁,甚至反制人类。当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过程成为“黑箱”,人类无法知晓决策过程,这将大大增加风险的不确定性。<sup>[19]</sup>

### (三) 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化现象最突出的特点并非在于它的统一性,而是体现在全球相互连接的本质所蕴含的复杂性与难以预测性。<sup>[20]</sup> 17 对于这种的不确定性,鲍曼提出三个有启发性的角度。其一,全球化剥夺了国家大量的先前的权力。<sup>[15]</sup> 引言11 比如,超越传统国家的国际资本,能够以超国家的力量干预某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sup>[15]</sup> 引言17 其二,网络等通信技术的发展,从信息差的角度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其三,有效的行动似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能力。强烈的不确定性已经渗透到了个体和共同的环境,但是全球性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sup>[15]</sup>

75

近些年,面对经济滑坡和国内矛盾,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进行贸易战,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经济领域的冲突加剧,也伴随着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冲突。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西方文明胜利的理论 and 萨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依然存在争论。西方国家通过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进一

步加强了文化的传播，发展中国家也在经济的发展中逐步觉醒了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国际形势紧张。不仅如此，在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当今依然存在某些局部的军事冲突，比如，近些年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些局部冲突产生了全球效应，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当然，虽然全球局势存在着紧张的趋势，但是国际交流与合作依然在深入发展，比如，“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很多地区和国家都积极尝试协同合作，解决全球性的共同问题。

## 二、不确定时代道德教育的双向境遇

不确定意味着挑战和机遇并存，对于道德教育而言也是如此。一方面它给道德教育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它也给道德教育带来了机遇。

### （一）不确定时代道德教育遭遇的危机

其一，人际信任丧失与道德冷漠危机。在熟人世界中，由于个体接触的对象较少，彼此知根知底，在他人需要帮助时，人们基于过往的情感联系，以及对未来的有效预期，更容易做出利他行为。所以，人际间的信任占据主导地位，不容易出现道德冷漠的问题。然而，在人际交往不确定的陌生人世界中，由于交往并不具有长期性和深入性，人们难以从过往的经历预测未来，并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所以，在面对他人的求助时，人们一般会倾向于观望，而非伸出援手。不仅如此，由于网络上一些自媒体对于某些极端事件的过度曝光，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进而加剧了道德冷漠的问题。所以像“吃瓜群众”这类的网络语言才流行开来。在教育层面，由于人际信任的丧失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尚未有效建立，一些学校出于安全的考虑也会夸大陌生人的危险，将陌生人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危险人物。这种夸大的方式会进一步助长人际间的不信任。

面对生存的不确定性，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也出现了增长趋势。因为面对生存的不确定性，个体在自己生存问题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很难去关注自身之外的他人。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人们对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造成了物欲不断膨胀。这也是物质丰裕时代依然需要关注节俭美德的重要原因。“个体化”进程让个体从传统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他们参与个体的竞争提供了可能性。确实，一些人通过竞争获取了新的社会身份，这种成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通过竞争赢得社会身份提升的机会。于是人们主动或被迫卷入竞争，造成“内卷”。“内卷”会产生诸多的消极影响，其产生的道德后果需要关注。它会造成人们不仅不考虑别人，还要打败别人，助推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再生产”，加剧人际间的冷漠与对立。

随着家庭变得不稳固，家庭难以发挥其安全的港湾功能，这会对人际信任的培育产生

消极影响。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它对于儿童基本心性和人格的培育具有奠基性作用。但是家庭变得不稳固，父母不仅没有太多时间顾及儿童，而且在离婚冲突中所展现的人性丑恶也会给儿童造成消极影响。长时间生活于此，不仅会让儿童的内心处于不安全之中，阻碍他们人格的健全发展，也助推儿童对于他人的不信任。

其二，传统科技伦理出现真空的危机。虽然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带来了传统科技伦理难以应对新问题的困境。过去的科技对于自然和人类的消极影响往往是有限且可预测的，但是现代科技的消极影响却是致命且难以预料的，比如，核武器、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虽然它们对于人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伦理规范其发展，一旦引发危机将是不可逆的，不仅会影响当代人，还会影响未来人。

现代科技的进步可能导致“道德盲视”，逐渐侵蚀人类的道德基础。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影响的加深，道德判断越来越依赖专业知识。过去，确保行为符合道德标准的知识是一种所有具备善良意愿的人都能感知到的知识，即使是智力水平一般的人也能轻易区分善与恶。然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对于日益复杂的现代科技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专业知识的个体和机构已经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当现代科技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它还可能阻碍人们的道德感知与情感反应，导致道德上的盲点和冷漠态度。例如，借助高科技武器，人们能够在远离现场的地方轻松实施大规模杀戮，从而避免了面对面时可能出现的道德冲突。由于过去人们并未掌握如此先进的科技，传统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其中的行为主体与“他者”都是共同在场的参与者。然而，面对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近距离伦理出现了真空，失去了效力。

其三，民族和国家等群体性自私的危机。在不确定时代，不仅个体会过度关注自身，同样民族和国家等群体也会因为不确定的消极影响，过度关注自身的利益，造成群体性自私。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指出，我们需要在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群体(包括国家、种族、经济等社会群体)的道德行为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群体的道德标准往往不及个体的道德标准。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首先，要塑造一种既能控制原始冲动又能维持社会团结的理性力量是极为困难的；其次，集体的自利行为与个人的自利欲望相互融合，最终仅仅以集体自利的形式显现。当集体与个人的私利在共同的冲动中结合，而不是谨慎地区分并表达各自的利益时，这种集体自利的形式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sup>[21] 3-4</sup> 不仅如此，由于群体性自私往往会被极端的民族和爱国情感所遮蔽，不像个体自私那样容易被人们识别其消极效应，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所以，道德问题越是从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向群体和集体之间

的关系，利己主义冲动对社会所占的优势就越大。<sup>〔21〕205</sup>

在不确定的全球时代，群体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群体自私性问题日益显现。高德胜指出，在20世纪之前，人类各个群体都生活在各自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就像是居住在地球的不同“碎片”之中。由于群体间的隔阂，自私行为所带来的苦难通常仅限于局部或地方层面，并未波及全球范围或影响整个人类。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言之，如果说群体的自私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全球局势不确定的背景下，群体性自私会加剧，甚至引发冲突。正如尼布尔所言，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实现群体自我意识的难度也随之增加。通常，只有当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发生冲突，或者在团结一致的氛围中，群体自我意识才可能被唤醒。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相当悲哀的一面，因为似乎只有通过冲突，才能激发出群体的团结精神。

〔21〕29

## （二）不确定时代道德教育面临的机遇

虽然不确定时代对道德教育产生了消极影响，让其处于危机之中，但是不确定时代也给道德教育带来种种契机。

其一，直面道德选择并承担道德责任的契机。在确定性的时代，人们能够依靠相对稳定的规则来规避道德选择中的不确定性。然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社会，普遍性的伦理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逐步丧失其效力，这使得人们重新体验到了原始的道德焦虑。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伦理”解构的时刻恰恰为“道德”的新生提供了土壤。“道德”代表着对他者的一种绝对责任，这种责任先于理性思考而存在，人类此前追求的确定性伦理实际上是对道德牺牲精神的遮蔽。因此，鲍曼说道，“我仍然相信对确定性的阻抑是道德之收获。”<sup>〔22〕261</sup> 这样的不确定情境为道德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承担责任创造了机会。实际上，道德选择本身就蕴含着不确定性，因为在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鸿沟，人们无法仅凭其固有的、普遍的知觉能力来预测这些后果。<sup>〔22〕20</sup> 相反，当人们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直面道德本身时，他们才可能真正承担起道德责任。

在曾经确定性较强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社会空间里，交往范围有限，交往内容也相对简单。在这样的环境中，道德规范通常是由上层制定并向上传达的，人们只需遵循这些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行事即可。在当今不确定性增强的陌生人社会中，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急剧扩大、交往层次的增加和交往内容的日益丰富，以及交往方式的多样化，道德关系也变得愈发复杂。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得现实世界中约束人们行为的因素，如舆论、组织、地区、国家等逐渐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仅由“数字符号”代表的虚拟身份。在这种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境下，传统的道德管理方式难以有效控制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管理。尽管最初可能不适应这种社会形态，但它标志着一个人人们能够更加自主地做出选择，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的社会到来。这样的社会将促使人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意识逐步觉醒，推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从依赖性向自主性转变，最终达到道德秩序建立的最高境界。<sup>[23]</sup>

其二，从近距离伦理转向远距离伦理的契机。人的道德评价范围与评价能力是社会的、历史的。现代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在传统领域内形成的旧道德受到冲击，提供了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转化的契机。远距离伦理是相对于近距离伦理而言，近距离伦理只涉及身边人和当代人，而远距离伦理则涉及远方人和未来人。约纳斯等人把这种伦理称之为“责任伦理”，现代科技影响的长久效应，需要这样的伦理。现代科技扩大了道德的向度，人的行为不再仅仅局限于其当前的现实环境，而是跨越了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因此，行为规范不应只关注即时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还应该在时间维度上考虑代际伦理，反思个人行为对未来社会的潜在影响；在空间维度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活动的增加，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应全球互联时代的全球化伦理体系。原本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远距离伦理的重要性，但是面对现代科技失控发展所产生的潜在风险和负面效应，人们会在心底产生恐惧的情绪，这种情绪会唤醒人们对远距离伦理的渴望。积极地看，这恰恰成为道德教育培育远距离伦理的契机。

其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机。面对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积极地看，这恰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当下，全球性问题已经不是单靠某个民族和国家就可以解决的，它往往需要站在全人类视角去思考和解决。鲍曼指出，我们的行为能力，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都无法有效地处理新出现的我们在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脆弱。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回去的路已经被切断了，地方性的方案并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对全球化的有效反应只能是全球性的。<sup>[15] 73</sup> 深入探究全球化的本质，至少涵盖两个关键层面：一是将全人类视作一个整体进行审视与分析，并基于此视角应对全球性挑战；二是承认超越单一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赢。一方面，人们已经科学地认识到人类同属一个物种，人类的整体利益是真实的，需要全体人类共同维护。另一方面，在全球问题面前，人类再也不是一个想象中的、飘渺的和被遗忘的概念，它成为一个真切的、有意义的实体。<sup>[24]</sup>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曾说过：“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人类

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sup>[25]</sup> 172。全球时代也酝酿着一场新的生存形态的变革，它为“世界历史人”的培育提供了可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距离被显著拉近，日常生活的共性愈发凸显，为彼此深入了解对方的习俗与偏好提供了更多契机。面对日益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终将意识到，无论是地球整体还是其任何部分，都不应被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尽管人们在政治或宗教信仰上通常有着极大的差别，有时还有着激烈的对抗，但是，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依赖他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他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sup>[15]</sup> 引言17-19 正如鲁洁所言，人类的生产实践正日益向全球性和复杂系统性转变。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各种信息、知识和文化的共享变得更加可能。同时，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得人类面临的是整个种族的生存问题，这一问题将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sup>[26]</sup> 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 三、不确定时代道德教育的应对

面对不确定时代对于道德教育的双重效应，道德教育应以新的思路去应对，化解其消极效应，利用其积极契机。

#### （一）法治观念和他者责任意识的培育

正如前文所言，不确定时代的生存是陌生人社会的生存，这种生存方式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生存。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可以基于彼此的直接信任进行交往，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的信任则往往需要通过中介来实现。因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不确定的，因而，彼此之间不可能借助于重复博弈来建立信任，最基本、最可靠的方式是来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的制裁。或者说，陌生人社会的信任从根本上讲是对第三方机构的信任。<sup>[8]</sup> 在传统的、相对封闭且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中，制裁主要依赖于道德舆论来执行。然而，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缺乏紧密的联系和共同的社会规范，道德舆论难以形成并发挥作用。随着道德舆论影响力的减弱，制裁的实施应该逐渐转向更为正式的组织，尤其是国家的相关机构，这些机构能够通过法律和制度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并实施制裁。这意味着，在构建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做法有所不同。传统社会倾向于将法律道德化，而在陌生人社会中，则需要更多地将某些道德规范明确化、正式化和法治化。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更为正式的制度来培养人们守信依规的行为习惯和精神品质。<sup>[8]</sup>

建立底线伦理并培育法治观念是不确定时代重建信任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底线伦理时，必须顾及不确定时代陌生人交往的独特性，并确立与之相契合的道德责任。通常而言，责任可划分为两类：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积极责任指的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消极责任

则是指不得妨碍他人的义务。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在公共场合和公共领域中主要承担的是消极责任。这意味着人们不应该干扰或妨碍他人的正常生活。至于是否以积极的行为去帮助别人，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义务。<sup>〔8〕</sup>为了保证底线伦理的落地，需要将其法治化，并培育人们的法治观念。对于法治观念的培育，可以从规则意识的培育做起。因为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具有相通性，所以，作为一种“前法治教育”的规则教育，对于法治观念的培育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现行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就是从规则意识开始，逐步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念。

在不确定时代，建立底线伦理并培育法治观念是必需的，但是道德教育还应培育他者责任意识，即主动承担道德责任意识。法律规范通过设定明确的标准来确保行为的底线，从而提供了必要的确定性。然而，这种确定性也可能限制了个体追求卓越道德表现的空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道德情境中，人们有机会通过主动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来彰显其德行。法治观念和他者责任意识的培育都是不确定时代所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和社会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言，在不确定的时代，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直面道德判断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人们具有他者意识，主动承担道德责任，才能展现人性的高贵。在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道德教育应当抓住“道德”重新显现的机遇，将其作为培养个体道德自主性的重要契机，并鼓励个体主动承担起对他者的道德责任。具体而言，其一，激发学生承担责任的情感，比如，同情、愧疚、勇敢等品质。其二，培养学生承担责任的能力，比如，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动能力。其三，提升学生承担责任的智慧。<sup>〔27〕</sup>

## （二）风险意识和远距离伦理观的培育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们所需面对的问题不再是是否存在风险，因为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风险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和规避这些风险。风险可能引发恐慌情绪，甚至使人陷入瘫痪状态；但它也可能成为推动新发展的契机。贝克认为：“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sup>〔28〕</sup> 118

面对不确定时代的风险，道德教育要培养学生的风险意识。一方面，必须学会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不可避免的风险。对于人类而言，有些风险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如果采取过激的行动，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人造风险。比如，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却与各类人为制造的风险紧密相连。因此，培养风险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学会理性地对待这些不可避免的风险。既然风险始终存在且无

法摆脱，那么人类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这正是人性中高贵之处的体现——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可以超越本能的情感。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提高减少制造人造风险的意识。贝克指出，当今时代的风险更多不是自然风险或知识缺乏的风险，而是人造风险，是人类知识过剩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在学会控制自然风险的同时，人类还必须有效地限制人造风险的产生。约纳斯和鲍曼等人提出，对人造风险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的恐惧，是促使人类减少人造风险的一条重要途径。

道德教育还要培育学生的远距离伦理观。正如前文所言，远距离伦理要求人们不能仅仅考虑眼前利益，还要看到未来利益和后人利益。培育这种伦理的关键在于恐惧。只有当人们对人类无拘无束行为的潜在后果感到极度恐惧时，人们才可能实现自我约束。约纳斯认为，未来的伦理学应该以对恐惧的探索为引导，探究恐惧在不确定性原则中的地位：“对厄运的预测被给予了比对幸福的预测更多的注意”。对于不断积累的危险的探索来说，“首先迫切需要的是维持和预防的伦理学而不是进步和完善的伦理学”。<sup>[22]</sup> 259-260 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 也认为，在未来，人类的共性与其说是对生活的希望，毋宁说是对未来的恐惧；与其说是对自身能够行善的信心，不如说是对自身可能作恶的担忧。<sup>[29]</sup>

122

除了恐惧的警醒作用，道德想象力的培育也有利于远距离伦理观的形成。道德想象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想象力，是蕴涵道德价值和道德意蕴的想象力。它可以帮助个体清晰把握可能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事前责任。因事前责任的“事前性”，使行为显现与责任践履之间留有些许“时间”及“空间”，以供个体在头脑中藉由道德想象力思量可能行为的道德后果及责任风险。<sup>[30]</sup> 斯蒂文·费什米尔(Steven Fesmire) 指出，想象力位于慎思的前景中，因而必然处于核心，而不单单作为道德判断与道德知识的补充。<sup>[31]</sup> 103 文学叙事是培育道德想象力的重要方式。它所建构的是“同中有异”的可能生活。通过这种可能性，人们能够超越地域、时间和经验的局限，发掘生活的多样可能性。<sup>[32]</sup> 道德两难故事的讨论也是培养道德想象力的重要方式。因为在讨论的过程，学生需要借助想象代入情境并作出合理的推论。

### (三) 类本性的激发和关系思维的培育

面对不确定时代，民族和国家等群体容易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全人类，进而陷入群体性自私。马克思曾强调人是类存在物，“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sup>[33]</sup> 57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人们创造出了超越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新空间。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激发类本性，并由此培育学生

的全球责任和团结意识已经具备了可能性。

我们要培养学生具有共在性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特质,这种共在性价值取向包含“共同”与“共容”两个层面。一方面,要让学生认识到生活中日益显著且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以及正在形成的共同规则和伦理;使他们了解当代人类发展中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并对违背这一趋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保持清醒认识。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人和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同取向和异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共生共荣,创造新的文化和新的价值。当然,激发类本性应符合人的社会性发展规律。一般而言,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包括:从没有意识到他人或社会的存在,到领会他人观点和社会规则,进而意识到普遍价值存在的过程。<sup>[34]</sup>因此,激发类本性的过程应当从对其他个体的理解开始,进而扩展到对群体和社会的理解,最终超越群体和社会层面,达到人类整体的水平。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在其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中,也将人的道德发展水平分为前习俗水平(或个人水平)、习俗水平(或社会水平)和后习俗水平(或人类水平)。为了更好地激发人的类本性,道德教育应按照自我扩展的逻辑进行,即不断引导学生超越小我,进入大我。比如,现行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来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和类本性的发展。

在不确定时代,为了更好地激发人的类本性,教育需要培育学生的关系思维能力。在以往的教育视域中,“实践”多以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为思考框架,将与主体不同的“他者”视为被支配的客体。这种以物为对象的“实践”思维框架很难找到突破单子式生存的事实和逻辑出发点。而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则将“实践”的视角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每个自我与他者都视为主体,在交往中既肯定自我价值,也尊重他者价值。<sup>[34]</sup>比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建立主体间性,形成主体之间的相关性和统一性。在教学领域,如果说传统教学论往往将教学过程视为认识过程,即教师引导学生认识教学内容的过程,那么在主体间性的视域下,教学过程则是通过多极主体对话,以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视界融合”的过程。<sup>[26]</sup>教学不再是冰冷的知识传递,而是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人格与人格的相互理解、相互温暖,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sup>[35]</sup><sup>3</sup>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David Geoffrey Smith)指出,全球时代的教育既要恢复个人真理也要恢复共享真理。师生之间贡献各自的才干,相互引导,臻入成熟,而非预先设定一个“永久”的结构。<sup>[20]</sup><sup>30</sup>在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感到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师生、生生之间彼此信任,大家内心想法能得到分享而不会遭到他人的嘲笑;师生、生生之间

的差异被视为大家共享未来的贡献。<sup>[20] 103-104</sup> 基于此,教师应担当起文化“调解人”的角色,以学生感到受益匪浅的方式对信息和文化进行解释。因为一切阐释工作的具体目的是求得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能够在最具创造性的意义上维护人类的福利,而不至于相互之间争斗不休。<sup>[20] 88</sup>

对于道德教育而言,不确定时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目前来看,以上三个方面的探索将有利于道德教育化解其消极效应,利用其积极契机。然而,对于不确定时代更需要有直面不确定的勇气,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地生成新的应对方案,以变应变。

#### 参考文献:

- [1] [英] 查尔斯·汉迪. 超越确定性——不确定时代的变革与机会 [M]. 周旭华,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 [2] [法] 罗朗·柯恩-达努奇. 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 [M]. 吴波龙,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3] [美] 罗伯特·鲁宾. 在不确定的世界 [M]. 李晓岗, 王荣军, 张凡, 译.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0.
- [4]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5] [德]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 个体化 [M]. 李荣山, 范譞, 张惠强,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6] [英]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M]. 谷蕾, 武媛媛,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7] [美]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不确定的时代 [M]. 刘颖, 胡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 [8] 王小章. “陌生人”: 从秩序的他者到新秩序 [J]. 浙江学刊, 2019(2).
- [9] [德] 齐美尔.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M]. 林荣远,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0] 徐凌. 科学不确定性的类型、来源及影响 [J]. 哲学动态, 2006(3).
- [11] 刘兵. 科学的“不确定性”与科学传播 [EB/OL]. (2022-06-13) [2024-12-14]. [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77991972\\_6404202402700zrwl.html](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77991972_6404202402700zrwl.html).
- [12] 王建华. 不确定的科学与有组织的科研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 44(2).
- [13] 叶立国. 科学技术的四种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规避路径——基于约纳斯“责任伦理”的考察 [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4(2).

[14] [美] 布莱恩·阿瑟. 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什么, 它是如何进化的 [M]. 曹东溟, 王健,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15]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 [M]. 郇建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6] [德] 汉斯·约纳斯. 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 [M]. 张荣,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7] [瑞士] 汉斯·昆. 世界伦理构想 [M]. 周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18] 杨慧民. 论科技人员道德想象力的基本特征 [J]. 江海学刊, 2014(5).

[19] 郑少飞, 姚建宗. 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法律分配路径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3).

[20] [加]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 [M]. 郭洋生,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1] [美]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M]. 蒋庆, 阮炜, 黄世瑞, 等,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22] [英]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伦理学 [M]. 张成岗,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3] 韩美兰. 现代科技发展对道德进步的意义 [J]. 理论探索, 2004(4).

[24] 蔡拓, 刘孟强. 全球性视角下人类类主体的理论分析 [M]. 天津社会科学, 2019(6).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6] 鲁洁. 走向世界历史的人——论人的转型与教育 [J]. 教育研究, 1999(11).

[27] 章乐. 在“伦理”和“道德”之间: 风险社会中道德教育的应然选择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8(5).

[28] [德] 乌尔里希·贝克, 约翰内斯·威尔姆斯. 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 [M]. 路国林,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29] [挪威] 拉斯·史文德森. 恐惧的哲学 [M]. 范晶晶,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0] 宋晔, 刘博文. 道德想象力与事前责任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3, 44(3).

[31] [美] 斯蒂文·费什米尔. 杜威与道德想象力: 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 [M]. 徐鹏, 马如俊,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2] 高德 胜. 道德想象力与道德教育 [J]. 教育研究, 2019, 40( 1) .

[33]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 格 斯 列 宁 斯 大  
林 著 作 编 译 局, 译.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00.

[34] 鲁洁. 人对人的理解: 道德教育的基础——道德教育当代转型的思考 [J]. 教  
育研究, 2000( 7) .

[35] [德]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 [M]. 邹进, 译.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  
联书店, 1991.